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唐诗选

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编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唐诗选

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唐 诗 选（共两册）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字数 50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7 插页 4

1978年4月北京第1版 197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584 定价 2.10 元

前 言

—

唐代诗歌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极其重要的阶段，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

从现存近五万首诗歌来看，唐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诗歌题材的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拓。唐代又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时代。仅《全唐诗》所录即达二千多家。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是负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唐代开宗立派、影响久远的大家，不下二十人。其余特色显著、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诗人，也有百人之多。唐代诗坛多种艺术风格的争奇斗艳，诗歌体制的完备成熟，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伟观，可以和思想史上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前后媲美。唐诗，是我国文学遗产中最灿烂、最珍贵的部分之一。

在唐诗研究中，困难不在于描述唐诗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繁荣的原因。我们在下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探讨。

唐诗繁荣的局面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等特定条件所促成，也是诗歌自身传统发展的结果。

唐诗的繁荣首先跟唐代的经济高涨和文化高涨是密不可

分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和政治、法律、哲学等其他上层建筑一样，总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恩格斯在论及十八世纪法国和德国哲学繁荣的原因时指出，“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一〕}。由于隋末农民大起义对于魏晋以来世族庄园经济的摧毁，由于唐初“均田制”的推行以及其他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促成了唐初一百多年的经济高涨，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唐时的中国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封建国家。正是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阶级的辛勤劳动，创造了雄厚的社会财富，成为包括诗歌在内的唐代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唐代国际文化的广泛交流，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密切融合，唐王朝对思想文化采取相对自由的政策，儒、佛、道思想容许同时并存等等，都是促成唐代文化普遍高涨的有利因素。尤其对诗歌发生直接影响的音乐、绘画、书法、舞蹈等艺术部门，都获得高度的成就。没有唐代音乐的普遍发展，就不可能出现白居易《琵琶行》、韩愈《听颖师弹琴》、李贺《李凭箜篌引》这类描摹各种器乐曲达到出神入化境界的诗篇。唐代的一部分诗歌是可以合乐歌唱的，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同饮旗亭听唱的传说^{〔二〕}，元稹的“数十诗”曾由余杭一位善弹箜篌的歌女商玲珑演唱^{〔三〕}，都是例证。唐代题画诗的兴起显然派生于绘画

〔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八五页。

〔二〕 唐薛用弱《集异记》中“王涣之”（即王之涣）条。

〔三〕 见元稹《重赠（乐天）》自注及“休遣玲珑唱我诗”句。

艺术的发展。象王维既是山水诗的大家，又是南宗山水画的开创者，他自称“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六首》之六）。这些艺术品种之间的创作精神和原则是相通的，它们互相吸收，彼此促进：画家吴道子曾学书法于张旭，提高了自己的画境；张旭观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一〕}；杜甫的名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风也宛如雄武健美的舞蹈，表现出相似的矫捷奔放的气势。张旭的草书，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就被并称为“三绝”^{〔二〕}，各臻其妙，相得益彰。可以说，唐代的各种艺术品种共同形成了一个时代的高度艺术水平，这为唐代诗人从事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积累和艺术营养。关于唐诗繁荣的经济、文化原因，许多论著都有阐述，我们不再详说。

庶族地主阶层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阶级基础，唐诗的繁荣又决定于这一阶层力量的勃兴和发展。

列宁指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而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他还指出，封建社会的“阶级同时也是一些特别的等级”，“等级的阶级”正是封建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三〕}。唐代正处在以新的封建等级制代替旧的封建等级制的时代，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

〔一〕 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

〔二〕 《新唐书》卷二〇二《李白传》。

〔三〕 《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九十三页注。

级这一主要矛盾的制约和影响下，统治阶级中的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势力发生了急剧的不同变化^{〔一〕}。如上所述，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以占有奴婢、部曲等劳动人手为特征的世族地主的经济力量，庶族地主的势力便应运而生，得到巨大的发展。经济地位的改变必然引起政治地位的改变。庶族地主与世族地主发生重新分割政治权力的斗争。李唐皇族原是陇西大姓，但与山东旧族（指居住在华山以东地区的王、崔、卢、李、郑等世族）存在尖锐矛盾。在这一斗争中，皇族地主是和庶族地主站在一起的。唐太宗李世民下令重修《氏族志》，高士廉等竟然仍定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三。李世民直接规定“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二〕}，用官职品级代替门第、身分作为划分氏族等级的新标准，借以贬抑世族。高宗李治时，宰相李义府因“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即指《氏族志》）”，进一步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是缙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

〔一〕 我们采用了有些史学家的观点，把我国封建社会一定时期的地主阶级，划分为皇族地主、世族地主、庶族地主三类。皇族地主是地主阶级专政的体现者，也是国家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世族地主，又称士族、豪族，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享有封建特权（如免税免役、所谓“官有世胄，谱有世官”的垄断官位等）。庶族地主，又称寒门，却没有或很少有这些特权。有的世族地主破落以后占地很少甚至全无土地，有的庶族地主却拥有大量土地，所以，我们不用“大地主”、“中小地主”来指称他们。

〔二〕 《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

号此书为‘勋格’”〔一〕。“地实寒微”的武则天执政时，更破格任用了一些庶族地主中的人物，其中许多就是因文学见长而被提拔的。这样，唐王朝虽然仍是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专政，但庶族地主阶层却已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

庶族地主阶层属于剥削阶级，是整个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因而在根本上是坚决维护封建制度的。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不象世族地主享有许多封建特权，比较了解人民的某些愿望和要求。他们是唐代历次“党争”中地主阶级革新派的阶级基础，也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基础。

已知的唐代二千多位诗歌作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工匠、舟子、樵夫、婢妾等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也有出身世家豪族的贵族诗人，但其基本队伍是寒素之家的封建知识分子。他们虽然积极跻身于封建统治的上层，但大多数仍然沉沦下僚，流浪江湖，经历了种种坎坷不平的遭遇，比较接近下层，加深了对于社会生活和斗争的认识。尤其重要的，确定一个诗人是什么阶级或阶层的代表，并不仅仅决定于他的出身。即使象杜甫那样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享有免赋免役的封建特权，但是，他的思想仍然反映了当时庶族地主阶层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利益和要求，也不能越出庶族地主阶层所越不出的根本的阶级界

〔一〕《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限。他也是这一阶层的代表诗人。没有庶族势力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勃兴，也就不可能会有代表他们利益和要求的诗人们在唐代诗坛上的活跃，这在下面还将论及。

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打破世族垄断政治、为庶族大开仕进之门的新的官僚选拔制度，也是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官人法，造成了世族对政权机构的世袭垄断^{〔一〕}。唐承隋制，发展了科举制度，设置进士、明经等八科来选拔人才。后又以明经、进士两科并重，又逐渐演变为进士科最为时所崇尚^{〔二〕}，台省要职、州县官吏多为进士科出身者所占据。而进士应试的主要科目就是诗赋。从过去依门第、身分得官，改为凭诗赋入仕，进而改变等级地位，这个重大变化不能不在地主阶级内部两派之间引起激烈的斗争。世族旧势力虽然已经大大削弱，但仍以族望、门第矜重于世，“虽国势不能排夺”^{〔三〕}，并在政治上互相勾结，攫取权力。如李治时的李敬玄，“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四〕}。这是撇开进士科与庶族争夺权力的一种手段。

〔一〕 唐柳芳《姓系论》：“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大姓，即望族）已。”（见《全唐文》卷三七二）。

〔二〕 《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三〕 《梦溪笔谈》卷二十四。

〔四〕 《旧唐书》卷八十一《李敬玄传》。

不少世族的政治代表更公开反对进士科，我们可举唐中叶的几个宰相为例。杨绾认为进士科造成“幼能就学，背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的“积弊”，要求取消^{〔一〕}。郑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八三六——八四〇）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二〕}。权德舆“未尝以科第为资”^{〔三〕}。说得最明白的是李德裕。他首先申明：“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这一自辩正好说明阀阅门第之家对进士科的敌视。他接着说：“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而“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熟习也”。他家甚至不置《文选》，鄙薄进士科的词章之学，“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四〕}。李德裕在唐后期不失为一位有所建树的宰相，但在进士科问题上，却典型地反映了世族的观点。世族势力的反对虽然一度影响到进士科的一些设施，然而终有唐一代，这一制度仍相沿不变^{〔五〕}。进士科不仅吸引庶族，甚至也吸引世族。要求取消进士科的杨绾，自己就是进士进身的，而

〔一〕《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二〕《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参看《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

〔三〕《国史补》卷中《耻科第为资》。

〔四〕《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参看《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

〔五〕《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进士》：“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暂改更，旋即仍旧。”例如《通鉴·唐纪三十》载：开元二十五年，玄宗下敕，因“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改试“大经十帖”。

且参加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主持的考试，以诗赋名噪一时。李德裕在上面我们所引的话之前，也承认他祖父李栖筠在天宝末年因“仕进无他伎（伎，技能。《新唐书》作“岐”，指没有其他门路）”，不得不举进士。连唐宣宗李忱也以自署“乡贡进士”为荣〔一〕。世族反对进士科的失败，其原因不是象某些封建史家那样归结为帝王的“好雕虫之艺”，而是皇族地主为了巩固它的政权，通过科举尽可能地扩大它的统治基础，吸收当时日益强大的庶族地主力量参加政权。李世民在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二〕，就透露出这个消息。

唐代诗人大都是庶族出身的举子。诗歌成为他们进入仕途的捷径。虽然试帖诗由于内容的陈腐和形式的呆板，很少有什么好诗，但以诗取士的制度，对于重视诗歌、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对于诗人们一般诗歌技巧的培养和训练，对于诗歌艺术经验的积累和研究，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宋代严羽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三〕以诗取士，使得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是诗歌作者，确实使诗歌成为唐代文化领域中的一个“专门”，成了知识分子毕生学习、钻研的必修科目。唐代诗歌的繁荣，是离不开这个诗歌大普及的局面的。

〔一〕《唐摭言》卷十五《杂记》。

〔二〕《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

〔三〕《沧浪诗话·诗评》。

与以诗取士的影响相辅相成，诗歌在唐代的社会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是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在任何时代所罕见的。诗人们可以利用诗歌来博取帝王贵族的赏识，也用它作为傲视上层社会的资本，“千首诗轻万户侯”^{〔一〕}。向达官名流干谒求进用诗，送人出使、还乡，慰人贬官、下第，也得用诗。诗歌的影响遍于许多社会阶层。元稹、白居易的诗曾传诵于“牛童、马走之口”，“衡卖于市井”之中，写在“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歌妓演唱，村童竞习^{〔二〕}。从李世民延请“四方文学之士”，备极奖掖，时人羡称“登瀛州”^{〔三〕}，到前面已提及的王昌龄等人旗亭听唱的传说，诗人们凭借诗歌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荣誉。唐诗与社会生活这种特殊的联系，与诗人们的生活、地位如此休戚相关，这种情况，既是唐诗繁荣的反映，也是唐诗繁荣的一种原因。

除了上述社会条件之外，唐诗的繁荣还取决于诗歌自身传统的发展。我国诗歌以《诗经》、《楚辞》为最早的高峰，但四言诗和辞赋在唐以前已经衰落和僵化。一种新的诗体——所谓近体诗，在六朝时逐渐酝酿、发展。齐永明以后诗人讲究声律，创作“新体诗”，到梁、陈时更加细密，终于在唐初沈佺期、宋之问手里产生了完整的五律和七律。长篇排律也

〔一〕 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诗。

〔二〕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及白居易《与元九书》。

〔三〕 《通鉴·唐纪五》。

在唐初出现。五绝源于六朝乐府和文人的联句，到唐初开始流行；七言四句的诗体起于六朝乐歌，文人写作七绝始盛于武则天和中宗李显时期。近体诗经历了长达二百年的逐渐演进的过程，正展示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唐初的两个现象很值得注意：一是有关声律对偶的著作大量出现，一是大型类书的成批刊行，都适应了律诗发展的需要^{〔一〕}。而歌行、乐府等古体诗也仍然具有别辟蹊径、另开新面的广大可能。事实上正是如此。唐代诗人为了反映重大社会问题或抒写深刻的政治感慨的需要，更多地运用篇幅较长、格律较宽的古体诗，在创作实践中创造出许多新体，形成唐代古体诗的独特面貌。当时其他的文学样式，如骈文已近僵化，短篇小说（传奇）和词在唐代后期才逐渐兴起，戏曲还处在萌芽状态。除了散文在反对骈文的斗争中获得重要成就外，只有诗歌，才具备广阔发展、不断创新的内在条件，是作家们反映生活、述志抒情、驰骋才华的理想领域。这就是唐诗繁荣的一个内在因素。

〔一〕前者如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诗髓脑》等，见唐德宗时曾来华学习的日本和尚空海所著的《文镜秘府论序》。序文中还说，在崔融等人以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的著作，已是“黄卷溢篋，绀帙满车”了（今大都已佚）。此类唐人著作，还可参看《诗薮·外编》（卷三）、《唐音癸签》（卷三十二）等。后者如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等。虞世南还有《兔园策》，已佚。这些类书编纂的直接目的是为写作骈文、辞赋提供词藻典故，但实际上也为律诗的写作提供资料。

二

我国古代诗歌在唐以前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思想传统。唐代诗人面对自己的时代，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表现了新的思想特色，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这个传统的内容。

唐代诗歌，特别是盛唐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强烈地追求“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的不平凡的生活。李白是惯用大鹏鸟来象征自己的豪迈气概和不羁精神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面提出了理想；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巨大感叹也包含着对创业的强烈渴望。杨炯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王维也说：“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这两位并不以政治抱负见称于世的诗人，也都表示出从军报国的热情。我国诗歌大量而集中地表现诗人的政治抱负，始于建安时代。曹操的《龟虽寿》、《短歌行》，曹植的《杂诗六首》（其五、六）、《白马篇》等，都表达了平定战乱的要求，带有那个历史动荡时期所特有的悲壮色彩。这个主题到了两晋南北朝几乎中断。唐代的许多诗人又大量地表达政治理想，充满着积极乐观的精神。李白和杜甫的“布衣卿相”的抱负就是典型的代

表。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这都表现了以前的诗歌中较为罕见的宏图壮志。

这些唐代诗人的政治理想的产生有它的社会和阶级根源。唐初的经济繁荣，政治统一，国力强盛，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诗人们对于建树功勋的种种幻想。当然，对于这种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如前所述，唐代庶族地主阶层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活跃于历史舞台，他们表现了革新政治的精神。李世民时的魏徵、马周、刘洎，李隆基时的张九龄等，都是庶族出身的著名宰执大臣。从布衣至卿相，不是诗人们一时的狂言大语，而是有现实依据的。总之，唐代这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所歌唱的理想，在实质上正是代表了这一阶层的政治要求。

唐代庶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都无视世族门阀那一套家教礼法，思想上狂傲豁达，不拘儒学正宗，行为也放浪不羁，“不护细行”，一直被世族所讥笑、鄙弃。其实，他们借助“任侠”的形式，“好语王霸大略”、要“游说万乘”、“喜仗义疏财”等，正是他们的政治理想的另一种说明或补充，他们的纵情狂放有时表现了理想不得实现后的牢骚情绪。而对权贵的蔑视和傲兀，则是一股冲击封建礼教的力量。李白是这种思想的杰出代表。他“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真

是“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一〕}。在这一点上，他发展了左思、陶渊明、鲍照的反抗权贵的精神，为后代对封建社会有不满情绪的人们所仰慕和学习。然而，这种思想性格有它软弱和消极的一面。由于庶族地主的阶级属性，李白实际上无法“不屈己，不干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无法脱离对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依附。他那么严厉地责骂了哥舒翰^{〔二〕}，但仍不惜向他“述德陈情”，吹嘘为“天为国家”所造就的“英才”^{〔三〕}，就是一个例证。李白又美化了他的放诞生活和傲世态度，并导向避世退隐、访仙问道的消极倾向，这些容易产生坏的影响。

唐王朝和我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这是我们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现象。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经历过国内各民族间的斗争和融合；然而，根据民族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原则，对于这些战争的性质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大致说来，天宝以前主要是解除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保卫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和平生产，保卫河西走廊的国际通道；天宝以后转为唐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征伐；安史乱后被侵扰的局势又逐渐形成。边塞诗历来就有歌颂和反对战争两种态度。六朝乐府中的《陇头水》、《出塞》、《入塞》、《从军行》等，偏重于战争苦难的描写，唐

〔一〕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

〔二〕 见《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诗。

〔三〕 见《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

诗同时发展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尤以歌颂较为突出。唐代岑参、高适等边塞诗人正确地歌颂了将士们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侵扰的英雄气概，但他们常常把爱国和封建忠君混淆起来，“丈夫誓许国”（杜甫《前出塞》）和“归来报天子”（王维《从军行》）在他们看来是同一个东西；他们还往往在“所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张籍《西州》）的理想中，夹杂着“将军天上封侯印，御史台中异姓王”（岑参《九曲词》）这一类对功名的庸俗追求。唐代诗人又正确地谴责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揭露了军中苦乐不均的尖锐对立，同情人民的苦难，但有的却抽象地反战，无原则地要求和平，这在中晚唐诗中存在不少的例证。

田园山水的描写也是唐诗的一个重要内容。陶渊明是我国田园诗传统的奠基者。他的田园诗固然表现了安逸闲适的避世思想，但他有“躬耕”的劳动体会，对劳动的农民有较为真切的感情，同时又含有洁身自好、不与统治阶级合作的反抗意味。唐代王维、孟浩然等田园诗人，他们的隐居田园，有的是政治失意后的归宿，有的是正在作官偶居“别业”，有的是致仕告退优游养性，有的则是当作仕进的“终南捷径”^{〔一〕}，因而大都失去对现实黑暗政治不满的意义；由于他们的生活条件，又大都失去歌颂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内容。不少诗人笔下的“田叟”、“溪翁”，实际上是隐士的化身。他们对于陶渊明的追慕，着重在“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王维《偶然

〔一〕 原语见《新唐书》卷一二三《卢藏用传》。